

·目录学·

《四库全书总目·孔子家语》篇发疑*

崔富章 陈英立

内容摘要:《孔子家语》是先秦文献,汉初孔安国重编,四十四篇,魏王肃注解,传承至今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“孔子家语二十七卷”,唐初颜师古注“非今所有家语”,他的意思是说,这个二十七卷本已经失传,从《七略》、《别录》揭示其篇目看,它不是传世今本《家语》之全部。颜师古、孔颖达、司马贞、张守节诸唐人皆不以“今本”为伪。北宋末刊《孔氏家语》十卷四十四篇王注本,卷十含孔安国叙录、孔衍上汉成帝书两篇重要文献。孔安国述本书要领,叙世本源流,至孔子第十三代孔安国(亦称十二世孙)止,其中记载多代多人事迹,为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、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所佐证,足可补正《孔子世家》阙讹。安国之孙孔衍诉刘向删减《孔子家语》篇目,可破解二十七卷(篇)本成书之谜。南宋朱熹言:“《家语》虽记得不纯,却是当时书”,并据以校正《中庸》。南宋末年,王柏虚拟“古家语”、“后家语”、“今家语”名目,谓“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,意王肃杂取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荀》、《孟》、《二戴》之余绪,混乱精粗,割裂前后,织而成之”。全无实证,不足为训。明人搜寻、传承宋本,功不可没。清乾隆年间,范家相撰《家语证伪》,孙志祖协同,渐成小气候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顺应王柏“怪变”之论,撮空演绎,迹近荒唐,影响深远,有必要逐条分析,正本清源。

关键词:孔安国 孔衍 王肃 朱熹 王柏 《四库全书总目·孔子家语》

《孔子家语》,宋刊本题《孔氏家语》,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故事的先秦文献,流转数百年之后,由十二世孙孔安国重编,四十四篇。孔序云: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《〈孔子家语〉研究》(项目编号:14BZW080)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“《孔子家语》整理与研究”(项目编号:1361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“《孔子家语》者，皆当时公、卿士、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、交相对问言语者，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，与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并时，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，别出为《论语》，其余则都集录，名之曰《孔子家语》。凡所论辩，流判较归，实自夫子本旨也；属文下辞，往往颇有浮说、烦而不要者，亦犹七十二子，各共叙述，首尾加之润色，其材或有优劣，故使之然也。”^①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皆著录于经部（含六艺略）论语类，“每叙于《论语》之后，实经部之要典也”^②。

朱熹认为：“《家语》虽记得不纯，却是当时书。”“《家语》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，其书虽多疵，却非肃所作。”^③唯其“不纯”，不够“高大上”，才近真实，接近当年生活场景，师徒相得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南宋末年，王柏标榜“古家语”、“后家语”、“今家语”三《家语》说，始发“怪变”之论。“古家语”什么样？“后家语”又什么样？指《论语》为“古家语”，小戴为“后家语”，根据什么？盖付阙如，蹈空议论，或只为与朱熹唱反调以鸣世而已。五百年后，清乾隆年间，范家相撰《家语证伪》十一卷，孙志祖撰《家语疏证》六卷，渐成气候，《四库全书总目·孔子家语》篇尤为突出：

魏王肃注。肃字子雍，东海人，官至中领军散骑常侍，事迹具《三国志》本传。是书肃自序云：“郑氏学行五十载矣，义理不安，违错者多，是以夺而易之。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，家有其先人之书，昔相从学，顷还家，方取以来，与予所论，有若重规叠矩”云云。是此本自肃始传也。考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“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”，颜师古注云：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。”《礼·乐记》称“舜弹五弦之琴，以歌《南风》”，郑注：“其词未闻。”孔颖达疏载肃作《圣证论》，引《家语》阜财、解愠之诗，以难康成；又载马昭之说，谓《家语》王肃所增加，非郑所见。故王柏《家语考》曰：“四十四篇之《家语》，乃王肃自取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荀》、《孟》、二戴《记》，割裂织成之。”孔衍之序，亦王肃自为也。独史绳祖《学斋佔毕》曰“《大戴》一书，虽列之十四经，然其书大抵杂取《家语》之书，分析而为篇目，其《公冠》篇载成王冠祝辞内有‘先帝’及‘陛下’字，周初岂曾有此？《家语》止称‘王’字，当以《家语》为正”云云。今考“陛下离显先帝之光曜”已下，篇内已明云《孝昭冠辞》，绳祖误连为祝雍之言，殊未之考。盖王肃袭取《公冠》篇为《冠颂》，已误合《孝昭冠辞》于《成王冠辞》，故删去

①宋刊本《孔氏家语·后序》。按汉人著述，书尾叙录，叙世本源流、先人事迹，述著作缘起，录篇目指要，《史记》、《法言》、《汉书》率沿斯例。北宋末翻刻《家语》书尾增题“后序”二字，以清眉目。清人范家相作《家语证伪》，改题“王肃后序”，没有举出务实证据。详参拙作《〈家语证伪·王肃后序〉辨误》，《孔子研究》2014年第2期，第59-64页。

②宋刊本《孔氏家语》毛晋题跋。

③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七《战国汉唐诸子篇》。见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：《朱子全书》（修订本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4233页。

“先帝”、“陛下”字，窜改“王”字。《家语》袭《大戴》，非《大戴》袭《家语》，就此一条，亦其明证，其割裂他书，亦往往类此，反覆考证，其出于肃手无疑。特其流传已久，且遗文轶事，往往多见于其中，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。其书至明代，传本颇稀，故何孟春所注《家语》，自云未见王肃本；王鏊《震泽长语》亦称“《家语》今本，为近世妄庸所删削。惟有王肃注者，今本所无多具焉，则亦仅见之也”。明代所传凡二本：闽徐燊家本，中缺二十余页；海虞毛晋家本，稍异而首尾完全。今徐本不知存佚。此本则毛晋所校刊，较之坊刻，犹为近古者矣。^①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总目》”）广征博引，力证其伪。如前所述，《孔氏家语》乃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重要载体，正史艺文志接力著录，否定这样一部典籍的真实性是大事，学界理应作出有力之回应。《总目》引用材料不实，论说自相矛盾，笔者不能认同，特作辨析如下。

（一）《汉书·艺文志·六艺略·论语类》著录“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”。唐初，颜师古注曰：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。”言下之意，或谓二十七卷本已经失传，“非今所有”。细审语势，又不尽然。二十七卷本虽佚，而篇目可知，《七略》、《别录》载有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全部篇目，颜师古是看得到的（《七略》、《别录》唐末毁于兵燹），拿它跟唐初见存的《孔子家语》四十四篇本（这个本子传承至今）比对，发觉刘向编校删定的二十七篇（篇卷合一为常例）本，并非今本四十四篇之全部^②。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者，“非今所有篇目”或“非今本《家语》全部篇目”之谓也。如果二十七篇在四十四篇中找不到对应篇目，或大多不对应，注例又当有别，“非今《家语》”足矣，不烦辞费。就是说，颜师古不以今本《家语》为伪。事实上，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孔颖达撰集《五经正义》，司马贞作《史记索隐》等等，屡屡称引《家语》，视若珍宝^③。《总目》说“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”，“不能废”是事实，说唐人知其伪，则没有文献支持。

（二）马昭率尔之言，《总目》称引失当。《尸子卷上·倬子》篇：“尧养无告，禹举辜[罪]人，汤、武及禽兽，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怀远也，圣人于大私之中为无私，其于大好恶之中为无好恶。舜曰：南风之熏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舜不歌禽兽而歌民。汤曰：朕身有罪，无及万方；万方有罪，朕身受之。汤不私其身而私万方。文王曰：苟有仁人，何必周亲？文王不私其亲而私万国。先王非无私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九十一，影印清乾隆六十年浙江刻本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769页。

②孔安国重编《孔氏家语》四十四篇，其中有十七篇散见于后来成书的大小戴《礼记》（只是大体重合，貌合神离者多）。西汉末刘向主持整理国家藏书，以《礼记》为本，缩编《家语》，当即引起孔府反弹，批评刘向“灭其原而存其末”，请求将孔安国原编四十四篇本并存于国家文献库。“奏上，天子许之。未即论定，而遇帝崩。向又病亡。遂不果立。”（宋刊本《孔氏家语》卷十叙录附孔衍上汉成帝书）因此东汉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仍是刘向删减的二十七篇本。

③参拙作《颜师古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考辨》，《文献》2013年第5期，第3-7页。

也,所私者与人不同也。”^①《孔氏家语·辨乐》篇:“子路鼓琴。孔子闻之,谓冉有曰:‘甚矣,由之不才也……昔者舜弹五弦之琴,造《南风》之诗,其诗曰:‘南风之薰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;南风之时兮,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’唯修此化,故其兴也勃焉,德如泉流,至于今,王公大人述而弗忘。”^②《礼记·乐记》: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,以歌《南风》。”郑玄注:“其辞未闻也。”孔颖达疏:“其辞未闻也者,此《南风》歌辞未得闻也……案:《圣证论》引《尸子》及《家语》难郑云:昔者舜弹五弦之琴,其辞曰:‘南风之薰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;南风之时兮,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’郑云‘其辞未闻’,失其义也。今案:马昭云,《家语》王肃所增加,非郑所见;又《尸子》杂说,不可取证正经,故言‘未闻’也。”^③崔按:《礼记·乐记》载舜歌《南风》,郑注:“其辞未闻。”多闻阙疑,慎言其餘,学者之态度,固当如是也。五十年之后,王肃《圣证论》引《尸子》、《孔氏家语》,将《南风》歌辞注出:“南风之薰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;南风之时兮,可以阜吾民之财兮”。马昭不以为然,批评说:“《家语》,王肃所增加,非郑所见。《尸子》杂说,不可取证正经。”何谓“杂说”?矛盾杂乱,《礼记》多矣。经传说记,传、说、记,众口一词,千人一面,其可得乎?礼物、礼器、礼仪,无不随着物质文化社会变迁而因革变化,因时、因地、因人而异,今未见有手捧礼书,亦步亦趋者。古今一理。郑玄当年不畏繁难,勇于为《三礼》作注,贡献多多,分歧亦多,尤其是《礼记注》^④。以郑玄“未闻”,别家“闻”者统统不作数,非“伪”即“杂”,目空一切,郑学传人,不当如是。《尸子》、《家语》所载《南风》歌辞,以及孔子之解读:“唯修此化,故其兴也勃焉,德如泉流,至于今,王公大人述而弗忘。”正是传说史学、文献史学佐证的大舜形象,文明传承之佳话也。

(三)文献所见马昭异辞,非此一例。《孔氏家语·庙制》:“子羔曰:‘敢问尊卑上下立庙之制,可得闻乎?’孔子曰:‘天下有王,分地建国,设祖宗,乃为亲疏贵贱多少之数。是故天子立七庙:三昭三穆,与太祖之庙而七。太祖、近庙,皆月祭之。远庙为祧,有二祧焉,享尝乃止。’”^⑤《礼记·王制》:“天子七庙:三昭三穆,与太祖之庙而七。”郑注:“此周制。七者,太祖及文王、武王之祧,与亲

①尸佼撰,(清)汪继培辑:《尸子》二卷,光绪三年浙江书局据湖海楼刊本校刻,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浙江书局汇刻《二十二子》本,第372页(中)。

②《孔氏家语》卷八,清光绪二十四年刘世珩玉海堂影宋刻本。

③《附释音礼记注疏》卷三十八,影印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1534页。

④1929年1月30日,章太炎先生致吴承仕书云:“鄙意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,本无纠葛。唯《小戴记》,杂以今文,郑君欲为会通,遂不免于辞遁。今于《小戴》不合者,直斥之可也。至夏、殷文献,本无可徵,郑说原非有明据。”见《章炳麟论学手札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年,第212页。

⑤《孔氏家语》卷八,清光绪二十四年刘世珩玉海堂影宋刊本。

庙四。太祖，后稷。”^①七庙之制，《家语》记孔子曰“天下有王，分地建国，设祖宗，乃为亲疏贵贱多少之数”，非专指一代。郑注“周制”，全靠纬书作证，正如太炎先生批评的“杂以今文，遂不免于辞遁……至夏、殷文献，本无可徵，郑说原非有明据”^②。“远庙为祧，有二祧焉”，“远庙”多“远”？《家语》未明言。郑注以“文王、武王之祧”充之，亦是周制^③。王肃《家语解》有异议，他认为：五服以内是近庙、亲庙，即父、祖、曾祖、高祖四庙；五服以外亲尽为远庙，《家语》“远庙为祧，有二祧焉”当指“高祖之父及祖是也”^④。不止周制，三王皆然。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引《圣证论》肃难郑云：“周之文、武，受命之王，不迁之庙，权礼所施，非常庙之数。殷之三宗，宗其德而存其庙，亦不为数。凡七庙者，皆不称周室。《礼器》云有以多为贵者，天子七庙。《孙卿》云，有天下者事七世。又云，自上以下，降杀以两。今使天子、诸侯立庙，并亲庙四而止，则君臣同制，尊卑不别。礼，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，况其君臣乎？”^⑤庙祭从无到有，庙数由少而多，因多而限额，由礼俗而礼制，经历了长期曲折的反反复复的过程，期间的变例、非常数，层出不穷。特别是远庙当毁，藕断丝连，人之常情，毁不毁^⑥，何时毁，迁主何去何从，都需精心算计，这就影响到对“祧”的理解^⑦，甚至庙数算法。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，封建制退出历史舞台数百年之后，庙制早已烟消云散，郑玄、王肃各尊所闻，说法不一，皆可谓一家之言。王肃注解跟《家语》“天子立七

①《附释音礼记注疏》卷十二，影印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335页。

②章太炎先生致吴承仕书。见《章炳麟论学手札》，第212页。

③1931年12月2日，章太炎先生致吴承仕书：“古庙制宜再精考。韦玄成、刘歆与郑氏义多不同，即《记》称诸侯不敢祖天子，而鲁有周庙，郑祖厉王，亦非《记》所能通，此事恐须博考经籍，非一家之言所能了。”见《章炳麟论学手札》，第224页。

④王肃注解：“祧，远意。亲尽为祧。二祧者，高祖及父母祖是也。”（《孔氏家语》玉海堂影宋刻本）“及”字为“之”之讹，“母”字为“及”之误，今以意校改。

⑤《礼记·王制》孔颖达疏引，中华书局影印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335页。

⑥文献记载鲁公有不毁者。《孔氏家语·辩物》：“孔子在陈，陈侯就之燕焉。子游见行路之人云：‘鲁司铎灾，及宗庙。’以告孔子。子曰：‘所及者，其桓、僖之庙。’陈侯曰：‘何以知之？’子曰：‘礼，祖有功而宗有德，故不毁其庙。今桓、僖之亲尽矣，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庙，而鲁不毁，是以天灾加之。’三日，鲁使至，问焉，则桓、僖也。”

⑦《礼记·王制》孔颖达疏引“儒者难郑云，《祭法》远庙为祧，郑注‘《周礼》云，迁主所藏曰祧’，违经正文。郑又云，先公之迁主藏于后稷之庙。先王之迁主藏于文、武之庙。便有三祧，何得《祭法》云有二祧？”见中华书局影印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335页。吴承仕《释祧》：“承仕窃谓郑君说庙制及祧字之义，皆非也。……寻郑君说祧不了之故，盖谓周七庙为权制，以文、武充二祧之数。二祧以藏迁主，而二祧又自为不迁之庙，故能所乱名守，漫而莫能理也。今诚以刘子骏、王子雍说，后稷为太祖庙，文、武为世室，犹殷之三宗，此三庙皆百世不迁。高祖之祖、高祖之父为二祧，高祖以下为四亲庙，此六庙皆以时而迁。由是删定，则二祧为远庙者，对四亲庙言之也。散文则亲庙、祧庙、始祖庙皆得名祧。祧之本字于兆域，亦无超上去之义。”（《制言》第三期，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出版）

庙”之说亦有距离,“非常庙之数”云云,在《家语》中亦无所依托。这说明,《家语·庙制》绝非王肃所作,他只是在“《家语》云”架构内,以《家语》解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见解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马昭竟不加区分,一股脑儿堆向《家语》:“且‘《家语》云’,先儒以为肃之所作,未足可依。”^①试问:以《家语·庙制》“天子立七庙”为“未足可依”,那么,《礼记·王制》“天子七庙”并郑注便都不“可依”,马昭置其祖师于何地?争胜负高于辨是非,莫此为甚!

(四)南宋末年,王柏(?-1274)撰《书疑》九卷,《总目》评曰:“其为师心杜撰,窜乱圣经,已不辨而可知矣。”^②王柏撰《诗疑》二卷,《总目》评曰:“《书经》虽颇有窜乱,尚未敢删削经文。此书则攻驳毛郑不已,并本经而攻驳之;攻驳本经不已,又并本经而删削之……此自六籍以来,第一怪变之事也。”^③王柏《鲁斋集》二十卷,《总目》评曰:“柏好妄逞私臆,窜乱古经。《诗》三百篇,重为删定;《书》之周《诰》、殷《盘》,皆昌言排击,无所忌惮,殊不可以为训。”^④《鲁斋集》卷一载《家语考》一篇,自述缘起云:“予每读《中庸集注》,以《家语》证《中庸》之有缺有衍。私窃疑之,因书与赵星渚言。答曰:‘文公谓《家语》为先秦古书,无可疑者。’因求《家语》之始末,而益有大可疑,请从而论之。”^⑤《礼记·中庸》一篇,问题多多,朱熹批评,绝非心血来潮,实乃根柢功夫使然。王柏号称朱门三传,实则骨子里相反。他“求《家语》之始末”的路线非常独特:先是虚拟《古家语》之总名,一无篇目,二无内容,混言无所不包,“《家语》之书,洙泗之传也,不幸经五变矣。一变于秦,再变于汉,三变于大戴,四变于小戴,五变于王肃,洙泗之流风馀韵,寂然不复存。”^⑥又说:“《论语》者,《古家语》之精语也;《礼记》者,《后家语》之精语也;今之《家语》十卷,凡四十有四篇,意王肃杂取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荀》、《孟》、《二戴》之绪馀,混乱精粗,割裂前后,织而成之。”^⑦王柏自谓“求始末”,“始”者虚拟《古家语》,“末”者“瓦砾”、“康瓠”《今家语》,中间《后家语》,自“始”至“末”,无文献支持,不出示证据,《家语考》和《书疑》、《诗疑》同科,“师心杜撰,不辨而可知矣”。《总目》竟一反常态,大段称引。王柏原是猜想“意王肃杂取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荀》、《孟》、《二戴》之绪馀,混乱精粗,割裂前后,织而成之”,《总目》改“意”作“乃”,特为之弥缝,不可为训!

(五)《总目》:“孔衍之序,亦王肃自为也。”考北宋末刊本《孔氏家语》卷末附孔安国叙录、孔衍上汉成帝书两篇重要文献,《叙录》经孔衍(安国之

①《礼记·王制》孔颖达疏引。中华书局影印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335页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三,第107页。

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七,第138页。

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五,第1409页。

⑤王柏:《鲁斋集》卷一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上海商务印书馆,1936-1938年,第8页。

⑥王柏:《鲁斋集》卷一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第11页。

⑦王柏:《鲁斋集》卷一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第11页。

孙)过录,与其所上书连为一体,《总目》不能分辨,混称“孔衍之序”,判言“王肃自为也”。孔安国叙录,孔衍上书,皆有史实根柢,不可能伪造。试举《叙录》记载孔府谱系五代为例:

第九代(八世孙)

孔鲋,字子鱼,后名甲,为陈王涉博士太师,卒陈下。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大体一致)

孔腾,字子襄,好经书,博学,畏秦法峻急,乃壁藏其家《孝经》、《尚书》及《论语》于夫子之旧堂壁中。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失载)

孔祔,字子文。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失载)

第十代(九世孙)

孔貜,字子产(孔祔所生),从刘邦起兵,垓下决战立大功,封蓼侯。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失载)

第十一代(十世孙)

孔臧(孔貜长子),袭蓼侯,官至太常。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失载)

孔襄(孔貜次子),字子士,后名让,为孝惠皇帝博士,迁长沙王太傅。(《孔子世家》把孔貜“次子襄”误读成“鲋弟子襄”,将九代孔腾与十一代孔襄混搭为一人,穿越九代孔腾、孔祔,十代孔貜,十一代孔臧,四位重量级人物名、字、事迹全部失载。)

第十二代

孔员,字季中(孔襄所生)。(《孔子世家》误作“子襄生忠”)

第十三代

(员)生武及子国。

孔安国,字子国,孔子十二世孙也。(裴骃《史记集解》引徐广所见《孔子世家》作“忠生武及安国”,孔安国排序十一代,十世孙。今本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作“忠生武,武生延年及安国”,孔安国排序十二代,十一世孙,皆与孔安国自述不合。)

第十代(九世孙)孔貜早年从刘邦起兵,战功卓著,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有所记述。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中蓼侯孔貜、孔臧,赫然在列。《年表》源自朝廷论功行赏、颁发丹书铁券之档案,足以佐证孔安国叙录为有根有本之史实,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阙讹,或为脱简所致。《汉书·孔光传》已经不知有光大孔门的蓼侯孔貜、孔臧两代祖宗了^①。孔光(前65-5)出生时,司马迁辞世不过二十五年。到两宋时期,孔传撰集《祖庭杂记》(南渡后更名《东家杂记》)、孔元措编纂《孔氏祖庭广记》,明末孔允植(1592-1647)编纂《阙里志》,皆沿

^①班固: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3352页。自孔子一代算起,孔霸是十五代,孔福、孔光是十六代(十五世孙)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失载两代。《汉书·孔光传》把《孔子世家》所载孔鲋与“鲋弟子襄”计作两代,顺排孔光作“十四世孙”,仍不准确。
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阙讹,谱系断裂两代。2009年版《孔子世家谱》,沿袭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阙讹,丢失第十、第十一两代,亟应补正。史实是不能由王肃“自为”的。孔子十二世孙(第十三代)孔安国,出生于公元前158年,距九世孙(第十代)孔貜以功封侯、获颁丹书铁券才四十三年;安国于公元前98年辞世,享年六十岁左右,曾事武帝为侍中,博士,谏议大夫,临淮太守^①。他是第二代蓼侯的侄孙,孔臧有“臣家业与安国纲纪古训”之语^②。《孔安国叙录》所载不仅有档案文献,更有亲历事实,岂是二百多年之后的王肃所能“自为”的?

孔衍上书皇帝,诉受命领校中秘书的刘向排斥其祖孔安国著述,《尚书传》五十八篇“不记于《别录》”,《论语训》十一篇不记于《古今文书论语别录》,不使名家;诉刘向以“近世小儒”戴圣杂录《礼记》为本,“见其已在《礼记》者,则便除《家语》之本篇,是灭其原而存其末”;要求“皆记录别见”,刘向二十七卷本,孔安国四十四篇本,并存于国家图书文献库中。上书所举,事实俱在,诉求平和,主张“皆记录”并存而已。鉴于孔霸(第十五代,孔衍伯兄)在朝野的崇高威望^③,孔光(第十六代)为成帝所倚重^④,孔衍上书能够抵达“最高”,成帝亲自过问,是合乎逻辑的。“奏上。天子许之。未即论定,而遇帝崩。向又病亡。遂不果立”。成帝“暴崩”,功亏一篑,毕竟有“天子许之”在前,主管归档,特为附记。当时的丞相,就是孔光。哀帝即位之后,孔光一度失势,遂不了了之。孔衍上书,跟孔安国叙录,都是从源头上研治《孔氏家语》的重要文献,为破解刘向二十七卷本形成机制提供了可能,为解读颜师古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六字注、确认自唐初以来传至今天的四十四篇本《孔氏家语》之地位,提供了重要源头文献参照^⑤。

王柏并不以孔安国叙录、孔衍上书为伪。“予读《家语》而得《论语》之原。其《序》谓当时公卿大夫士及诸弟子,悉集录夫子之言,总名之曰《家语》。斯言得之矣……孔子十三[四]世孙衍,上书言‘戴圣近世小儒,以曲礼不足,乃取《孔子家语》杂乱者,及子思、孟轲、荀卿之书以裨益之,总名曰《礼记》。遂除《家语》本篇,是灭其原而存其末也’。以是观之,《礼记》成而《家语》又几于

①参胡平生《孔安国大事年表》,见北京大学《国学研究》第七卷刊载胡氏著《阜阳双古堆汉简与〈孔子家语〉》,第12-13页(总第526-527页)。

②见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司马贞《索隐》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900页。

③昭帝末年博士,宣帝时为太中大夫,以选授皇太子经。元帝即位,徵霸,以师赐爵关内侯,食邑八百户,号褒成侯。“及霸薨,上素服临吊者再,至赐东园秘器钱帛,策[册]赠以列侯礼,谥曰烈君。”见班固《汉书·匡张孔马传》,第3353页。

④孔光为成帝朝博士,尚书,尚书仆射,尚书令,领尚书事,典枢机十馀年,徙光禄勋御史大夫,“丞相方进薨,召左将军光,当拜,已刻侯印书赞,上暴崩,即其夜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。”见班固《汉书·匡张孔马传》,第3352-3356页。

⑤参拙作《〈孔子世家〉补正》,《孔子研究》2013年第5期。《〈家语证伪·王肃后序〉辨误》,《孔子研究》2014年第2期。

亡矣。予于是有曰：《论语》者，《古家语》之精语也；《礼记》者，《后家语》之精语也；今之《家语》十卷，凡四十有四篇，意王肃杂取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荀》、《孟》、《二戴》之绪馀，混乱精粗，割裂前后，织而成之”^①。手握真实文献，却推导出匪夷所思之结论，是乃王柏特色，《书疑》、《诗疑》皆然。可以确认的是，王柏不怀疑孔安国叙录、孔衍上书两篇文献的真实性。“孔衍之序，亦王肃自为也”之语^②，当为《总目》所加，从行文语势看，有假名之嫌。

（六）《孔氏家语》与汉昭帝冠礼完全不搭界，《大戴记》倒是有瓜葛。《总目》说“《家语》袭《大戴》”，纯属无中生有。对应段落具列于下：

周公命祝雍作颂，曰：“祝王达而未幼。”祝雍辞曰：“使王近于民，远于年，啻于时，惠于财，亲贤而任能。”其颂曰：“令月吉日，王始加元服。去王幼志，心是袞职。钦若昊天，六合是式。率尔祖考，永永无极！”^③（《孔氏家语·冠颂》）

周公使祝雍祝王，曰：“达而勿多也。”祝雍曰：“使王近于民，远于年，啻于时，惠于财，亲贤使能。”“陛下离[摛]显先帝之光耀，以承皇天之嘉祿。钦顺仲夏[春]之吉日[辰]，遵并[普遵]大道之邠或[郊域]，秉集万[率百]福之休灵，始加昭明之元服。推远稚免[冲孺]之幼志，崇[蕴]积文武之宠[就]德，肃勤高祖之清庙，六合之内，靡不息[蒙德]，陛下永永，与天无极！”孝昭冠辞。^④（《大戴礼记·公冠》）

两书所载周公冠成王祝辞近似，应该共有所本，亦不无差异。《家语·冠颂》：“周公命祝雍作颂，曰：‘祝王达而未幼。’”“达而未幼”者，期望成王担当起治天下重任也。“令月吉日，王始加元服。去王幼志，心是袞职。钦若昊天，六合是式。率尔祖考，永永无极”，颂辞与周公指示相呼应，气脉贯通。《大戴记·公冠》：“周公使祝雍祝王，曰：‘达而勿多也。’”“勿多”者何？辞费欤？脱离主旨，言不及义，那还是孔子梦想的周公吗？两书更大的差别是，《大戴记》弃成王冠颂而改换《孝昭冠辞》（实为颂辞），洋洋八十馀言，超过成王冠颂两倍以上。成王冠颂不用虚字，与周颂、鲁颂风格相近。“陛下离[摛]显先帝之光耀，以承皇天之嘉祿。钦顺仲夏[春]之吉日[辰]，遵并[普遵]大道之邠或[郊域]，秉集万

①王柏：《鲁斋集》卷一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，第9页、第11页。

②《鲁斋王文宪公文集》二十卷（卷之九《家语考》），胡宗楸辑刊《续金华丛书》本，据明正统刊本翻刻，1924年。前有胡风丹辑刊《金华丛书》本《鲁斋集》十卷（卷之一《家语考》），据明崇祯五年阮元声刊本翻刻。两本《家语考》，并无“孔衍之序，亦王肃自为也”之语。

③录自刘世珩玉海堂影宋刻本《孔氏家语》卷八，清光绪二十四年。朱熹《仪礼经传通解卷一·冠义第二》校云：“‘是’字本缺，今补。或曰当作‘一心’。”

④录自孔广森《大戴礼记补注》卷十三，中华书局，2013年，第239-240页。今据孔广森引《博物志》校补，校以[]标示，补以□标示。

[率百]福之休灵,始加昭明之元服”,孝昭冠颂拉杂堆砌,哪有成王冠颂“令月吉日,王始加元服”简约而动听?“六合之内,靡不息[蒙德]。陛下永永,与天无极”,媚于一人,哪有“钦若昊天,六合是式。率尔祖考,永永无极”气象高远,道路自信!《总目》却说:“王肃袭取《公冠》篇为《冠颂》,已误合《孝昭冠辞》于《成王冠辞》,故删去‘先帝’、‘陛下’字,窜改‘王’字。《家语》袭《大戴》,非《大戴》袭《家语》,就此一条,亦其明证,其割裂他书,亦往往类此。”案:《家语·冠颂》记孔子师徒七问七答,全方位展示孔子关于冠礼的主张。《大戴记·公冠》所记,七问全无,七答仅存其二,断烂不完,朱熹《仪礼经传通解·冠义第二》全文辑录《家语·冠颂》,视为“经传”之“传”(chuán),并加通解,又有十四处明引王肃注为正解,偶尔涉及《大戴·公冠》而已^①。《总目》谓“王肃袭取《公冠》篇为《冠颂》”,蹈空之论,不辨而可知矣。《家语·冠颂》记周公冠成王,祝辞、颂辞具备,《总目》谓《冠颂》“已误合孝昭冠辞于成王冠辞”,真是无中生有,断非事实。至于“删去‘先帝’、‘陛下’字,窜改‘王’字”,变孝昭冠颂为成王冠颂云云,原本具在,一试便知,完全不可能。把堆砌状词、填充虚字、有巧无气的孝昭冠颂改写为成王冠颂,无异于痴人说梦!《家语·冠颂》、《大戴·公冠》,全篇具在,《总目》竟视而不见,撮空演绎,走火入魔,迹近虚妄!

嘉庆间,王聘珍《大戴礼记解诂》自叙云:“近代以来,人事校讎,往往不知家法。王肃本点窜此经,私定《孔子家语》,反据肃本改易经文,是犹听信盗贼,研审事主,有是理乎?”^②王氏指认“盗贼”,赃证几何?《总目》“就此一条,亦其明证”云云,还是无中生有的伪证。《孝昭冠辞》明明在《大戴礼记·公冠》篇内,跟《孔氏家语》根本不搭界,也就是说,“赃”就在事主家里,主人(或其代理人)却煞有介事地嚷嚷外面有“盗贼”,有是理乎?《大戴礼记解诂目录》又曰:“篇末有《孝昭冠辞》,以及祭天、祭地、祭日祝辞,是后人窜入,非大戴原书所有也。”何时窜入?起码在南朝萧梁剡令刘昭之后,王聘珍据刘昭注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所引《孝昭冠辞》而立论。果如王氏推断,则王肃(195-256)辞世之前必须预知三百年后有人把《孝昭冠辞》窜入《大戴记》,然后才能“点窜此经,私定《孔子家语》”呀!然后才能成全《提要》所谓“王肃袭取《公冠》篇为《冠颂》,已误合《孝昭冠辞》于《成王冠辞》,故删去‘先帝’、‘陛下’字,窜改‘王’字。《家语》袭《大戴》,非《大戴》袭《家语》,就此一条,亦其明证”呀!一堆莫须有,荒唐!

(七)《孔子家语》善本得失分析。明刊《孔氏家语》十卷四十四篇王肃注本,传世善本主要有嘉靖三十三年黄鲁曾刊本和崇祯初毛晋汲古阁刊本。两本

^①《仪礼经传通解》卷一,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:《朱子全书》(修订本),第72-76页。

^②王聘珍:《大戴礼记解诂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5页。

各有所长,毛本略优,主要是卷九、卷十两卷,毛本秩然不紊,而嘉靖本则多有错乱。明天启、崇祯间(1627),毛晋自湖州贾人购得《孔氏家语》宋刊本一部,亟付剞劂,是为汲古阁刊本,虽然优于嘉靖黄本,自身亦有短板,它的底本——毛晋所得第一个宋本残缺卷一、卷二(十六叶以前),替补的明本讹误颇多,造成先天不足。崇祯九年(1636),毛晋南都应试而旋,汲泉于惠山之下,偶登酒家蒋氏楼头,见残书三册,恰是宋刊王注《家语》,其卷八至十已供酒工之用,而前半尚全,喜而购归,倩善书者互为补治,前得宋本补抄卷一卷二,后得宋本补抄卷八至十,俨然双璧矣^①。“后璧”烬于绛云楼之火。“前璧”经多次易手,终为刘世珩购得,刘氏于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倩高手陶子麟影刻,这就是《玉海堂景宋丛书》之一的《孔氏家语》十卷。民国七年(1918),“前璧”亦毁于浦口旅邸^②。多亏刘世珩有先见之明,旋得旋刻,宋本化身千百,既可订正嘉靖本九、十两卷之颠倒错乱,又能弥补汲古阁刊本一、二两卷之先天不足,后来居上,是名副其实的《孔子家语》传世第一善本^③。《总目》以毛氏汲古阁校刊《孔氏家语》十卷为善本,没有同时揭示其得失节点,以及补救之道。特作善本分析,要在标榜第一善本——贵池刘世珩玉海堂影宋刻本。先贤有言,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,事倍功半呀!

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,本是《总目》的强项。《孔子家语》提要,竟是如此例外,核心观点,有失偏颇,论证程序,极不规范。这跟当年妖魔化《孔子家语》的小气候,不无关联。这一现象从反面证明,《孔子家语》具备实力,非同凡近。那草根而不凡的,有血有肉有体温的孔子师徒群像,足以令整死孔子的荐绅先生们目瞪口呆。绝粮陈蔡,弟子菜色,子贡走市场化路线得粮数升,烹煮坏屋之下,“尘墨”堕饭中,颜回捞而食之,子路举报偷饭。孔子做调查研究,表彰颜回,号召向他学习。这般故事,荐绅先生范家相、孙志祖者“难言之”,定性为诬谰圣贤,伪造无疑。于是找了个叫王肃的做替“罪”羊,传闻他有“前科”,“推定”即可结案。错案,疑似错案,理当重审,无论涉及到谁,尤其是《总目》这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案例,证词,证据,程序流程,都应重审,还学术界一个“明白”。

【作者简介】崔富章,男,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。研究方向:版本目录学、楚辞学。

陈英立,女,浙江大学古籍所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版本目录学。

①参见刘世珩玉海堂影宋刊《孔氏家语》十卷,卷末影刻毛晋、毛扆跋,清光绪二十四年。

②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531-532页。

③周晶晶:《〈孔氏家语〉汲古阁刻本考》,《文献》2013年第3期,第59-68页。